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刘亚轩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度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关键词:清初;中国礼仪之争;马国贤;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08)06-0040-05

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是度劳会会士,通过研究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这场著名的争论。

一、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译名问题,二是对于祭祖和敬孔的看法。天主教最初入华时,有传教士将天主教所信奉的造物主“Deus”一词音译为“陡斯”。后来罗明坚(Michele Pompilio Ruggieri)又把它意译成“天主”。利玛窦(Matteo Ricci)认为“天主”一词有天地主宰之意,与天主教的创世说非常一致,就沿用了这种译法。他甚至把自己所写的《天学实义》改名为《天主实义》。在《天主实义引》中,利玛窦说:“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1]利玛窦这里所说的“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就是他在《天主实义》中多次提及的“天主”。后来,利玛窦在研读儒家经典时,从《中庸》、《诗经》等古籍中发现“上帝”和“天”的含义与“Deus”一词非常相近。于是,他主张用“天”、“天主”和“上帝”来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至于祭祖和敬孔,利玛窦认为它们仅仅是一种没有掺杂任何偶像崇拜因素在内的世俗礼仪,与天主教义并不矛盾,因此,利玛窦允许天主教徒祭祖

和敬孔。

利玛窦这么做就是想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补儒合儒,从而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利玛窦适应性的传教方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宗教宽容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为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康熙皇帝把利玛窦的传教方法称为“利玛窦规矩”。

继耶稣会士之后来华的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认为祭祖和敬孔是迷信的行为,从而挑起了中国礼仪之争。由于各个修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不同,中国礼仪之争愈闹愈大,最后闹到了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那里。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颁布圣谕,禁止用“天”和“上帝”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禁止祭祖和敬孔。马国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教皇所派来中国。

二、马国贤传教活动

1. 灵活传教

马国贤1682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南部的小镇爱波里(Eboli),1707年受教皇所派以画家的身份到中国传教,1710年抵华。作为教皇所派的传教士,马国贤坚守教皇禁约。马国贤为人小心谨慎,精明能干,他在传教时比较灵活。

康熙皇帝曾经下令在华传教士必须领票方可传教,否则逐回西洋。领票意味着赞同“利玛窦规矩”。马国贤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在中国礼仪之争上,马国贤当然是反对“利玛窦规矩”的。但是如果领票,马国贤就无法在中国立足。为了

传教计，马国贤违心地领了票。

马国贤对于1704年教皇禁约没有明确禁止的但是又与礼仪之争有关的事情，他变通地予以执行。马国贤参加了康熙皇帝祭天的庆典。根据中国古代礼制，祭礼必须与人的身份地位相匹配，皇帝祭天，诸侯祭名山大川。

在回忆录中，马国贤说祭天时要宰杀很多牛羊作为牺牲，并且还要举行各种礼仪，中国人要斋戒、沐浴和禁欲。在禁欲期间，不能吃新杀的动物，如果要吃的话，只能吃过去杀的动物。马国贤对于祭祀的规则非常了解。他说儒家士大夫崇拜天，为此目的，皇帝在北京和南京建了两个宏大的庙宇。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拜天，如果皇帝因故不能祭天，就由宰相代祭。其他任何人胆敢祭天，就是犯了欺天大罪，要受到严惩。^[2]马国贤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1704年的教皇禁约明确规定不能使用“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这些词除了指天上的天本身的力量以外没有其他含义，只要这些词意味着看得见的物质的天，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传教士们就不能用这些词。他们不能让教外人士批评认为基督宗教的对神的礼拜并没有什么，只是崇拜物质的天或天力而已。”^[3]教皇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在暗示皇帝在北京和南京的天坛上按照儒家的郊祀礼仪举行的祭天仪式违背天主教义，可能是害怕过于得罪中国皇帝，教皇在禁约中没有公开禁止皇帝祭天。然而，在欧洲，皇帝祭天也是中国礼仪之争的焦点之一，马国贤参加祭天实际上是非法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为了在中国传教，马国贤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在马国贤看来，1704年教皇禁约没有明确禁止祭天，那么他参加祭天仪式就不算违背天主教义和教皇的命令。

马国贤知道，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悠久，在宫廷的势力很大，而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教廷和耶稣会士的观点迥异。要想在清宫立足，马国贤必须与耶稣会士和睦相处，因而，马国贤极力与耶稣会士打成一片。马国贤与阳秉义（Francois Thilisch）关系甚笃，还把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和罗怀忠（Joseph Costa）引荐给康熙。

马国贤很清楚传教工作如果得不到中国官员的支持，就不会取得进展，因而，除了结交耶稣会士之外，马国贤还施展手段，拉拢朝廷官员。1711年，马国贤随康熙到热河去避暑，还没有出北京城，马国贤就从马上摔了下来，头部受了重伤。康熙派了一个调查组前来调查马国贤坠马之事。调查组

由两名官员、三个听差和两个医生组成。这使选马给马国贤的官员和负责安排马国贤行程的官员高度紧张，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唯恐马国贤把责任归咎于他们从而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马国贤觉察到了这两个官员的心病，他觉得这是拉拢他们的好机会，于是马国贤就说自己是因为不善于骑马才坠落的，马没有问题，是一匹很好的马。马国贤的举动使这两个官员避开了一场灾难，赢得了他们的感激。在日后的很多事情上，他们都尽力帮助马国贤。

2. 坚持原则

尽管马国贤的传教方法比较灵活，但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决不退让。对于违反教皇禁约和天主教义之事，马国贤要么机智地躲避过去，要么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康熙死后，灵柩要运到沈阳的祖陵安葬，雍正皇帝命令马国贤等传教士陪送灵柩一段路程。根据中国的传统，送葬队伍在行进过程中，经常会停下来做祭祀。传教士如果参加这样的活动，就意味着违反教皇禁约。马国贤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做法，当送葬队伍走出好远已经看不见队伍前面的祭祀活动时，马国贤才骑上马，跟在队伍后面。这样，马国贤不但遵守了教皇禁约，而且又丝毫不留口实给一直敌视传教士的中国官员。

马国贤刚到北京时，康熙赏给他御膳。马国贤进行了对康熙表示感恩的叩头之礼，他认为叩头是世俗礼仪，没有什么宗教的意味。但是马国贤谢绝了吃肉，他告诉主管的太监因为当天是星期五，天主教不允许。马国贤在这儿所指的是天主教的小斋礼仪。小斋是天主教的虔修方式之一，目的在于“节制自身”，通常规定在星期五不许吃肉，以便进行减食。由此可见，对于天主教义，马国贤是坚决遵守的，丝毫不容妥协。

三、马国贤与耶稣会士的矛盾

虽然马国贤机智聪明善于应变，传教方法灵活，但是他毕竟是教廷的人员，在中国礼仪的问题上，他与耶稣会士势同水火。马国贤努力与耶稣会士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由于根本立场的对立，马国贤的收获很小，除了与个别耶稣会士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之外，整体上，马国贤和耶稣会士处于敌对状态。一些与耶稣会士交往密切的官员也和耶稣会士一起压制、打击马国贤。

在耶稣会士里面，最敌视马国贤的要算是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巴多明是法国耶稣会士，

精通汉语和满语,曾在罗马教廷、俄国、葡萄牙等使节来华时担任翻译,历侍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深受康熙的喜爱。巴多明曾在康熙面前造谣说马国贤不是教廷所派,这使他忐忑不安。1720年,罗马教皇派嘉乐(Carlo Mezzabarba)使华,马国贤不得不请嘉乐为之辟谣。嘉乐使团动身之前,教皇先派两个巴尔纳彼德会士费理薄(Filippo Maria Cesati)与何济格(Onorato Maria Ferrari)携带教皇的信见康熙,告诉出使之事。由于担任翻译的巴多明的歪曲翻译,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巴多明说他们是教皇派的制裁官,专门制裁不听教皇命令的传教士。对于巴多明的所作所为,马国贤极力反对。他向康熙皇帝说明传信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马国贤的极力争取下,费理薄与何济格才得以释放。^[4]

为了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人才,马国贤招收了4个中国男孩作学生。他花费大量时间培训他们,外出时经常带着他们。耶稣会士给当时的北京天主教主教伊大仁(B. della Chiesa)送去一份抗议书,说马国贤像一些中国大臣的所作所为那样,在皇帝的随从队伍里乘坐着载满男孩的马车招摇过市,这对天主教会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全国性的大丑闻。耶稣会士这是在明确指控马国贤犯了同性恋之罪。天主教会对待同性恋制裁甚严,耶稣会士指控马国贤犯了同性恋之罪,可谓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对于耶稣会士对马国贤的指控,伊大仁想息事宁人。伊大仁是方济各会士,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反对耶稣会士,他不想在此事上得罪耶稣会士,就说马国贤招收中国男孩一事没有得到他的批准,并且还劝告马国贤遣返3个男孩,剩下的那个作为仆人,除了教他中文之外,不要教别的任何东西。

马国贤没有听从伊大仁的劝告。马国贤深知耶稣会士的指控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本来就猜忌外国人,耶稣会士的指控一旦成立,马国贤在中国人中间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不但会导致传教工作的失败,而且还有可能导致马国贤被驱逐回西洋。耶稣会士的指控如果传到欧洲,马国贤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受到教会的严惩。因而,马国贤称耶稣会士的指控是“针对我的人身的一连串最恶毒的发明”^[2]。面对耶稣会士的指控,马国贤据理力争。他写了一份详细的辩护,列举了很多足以让耶稣会士心惊肉跳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指控。耶稣会士毕竟做贼心虚,他们知道自己的指控是无中生有,害怕事情闹大以后不利于自己,就收回了对马国贤的指控。

耶稣会士立足清宫较早,他们结识了一些支持

其传教路线的官员。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这些官员站在耶稣会士一边,他们敌视马国贤,处处与他作对,赵昌就是这些官员的代表。

赵昌是康熙的贴身侍卫,对耶稣会士的帮助很大,尤其在促成1692年容教诏令的颁布上。不少耶稣会士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对赵昌赞不绝口。自从马国贤等人来华后,赵昌就视他们这些坚持教皇禁约的传教士为眼中钉。

马国贤在古北口传教时,曾告诫入教的士兵遵守教皇禁约,放弃中国礼仪。后来,古北口的军官死了,这些士兵拒绝为他办丧事。赵昌就指使人伪造了一封学生家长们的信,以此事为借口,要求把学生带走。此外,赵昌还让人给学生家长写信,说马国贤绑架了他们的孩子,怀有不良企图,居心叵测。赵昌警告他们要把孩子从马国贤那里带回家,否则这些孩子肯定会遭受可怕的惩罚。赵昌还造谣对马国贤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说马国贤招收中国学生没有得到康熙的批准,康熙必定会龙颜不悦,企图以此动摇马国贤的信心。

马国贤识破了赵昌的离间之计,及时与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沟通,他们一致同意继续朝着天国之路前行,不用考虑赵昌的威逼利诱。马国贤比较冷静,也比较谨慎,为了不进一步招惹赵昌,他决定除当前已经招收的学生之外,不再多招学生。

马国贤称赵昌“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2],雍正即位后,赵昌被抓,马国贤极度兴奋,说这是赵昌罪有应得。根据马国贤的记载,赵昌被判以枷刑,他的家被抄,财产被没收充公,家人被贬为奴隶,妻妾被分配给别人。

四、马国贤与反天主教的官员之斗争

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马国贤除了与耶稣会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斗争外,还要与一直反对天主教的中国官员作斗争。

天主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的很多教义如上帝创世、天堂地狱、三位一体、耶稣降生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尽管天主教士采取了合儒补儒的策略,但是仍有不少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洪水猛兽,不时有朝中和地方的中国官员以天主教禁止祭祖敬孔为口实来请求禁教。

1710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发布通谕要求所有传教士遵守1704年的禁约和多罗的南京通告。1711年3月15日,克莱孟十一世发布文件谴责澳门主教虐待多罗。教皇的通谕和文件在在华传教士中间掀起了波澜,使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更加激烈。

一些官员得知教皇的通谕和文件后,就上书请求禁教,他们“想使天主教信仰在中华帝国绝迹”^[5]。

1711年底,御史樊绍祚上奏,说:“今有西洋人等造为异说,名曰天主教,臣访闻近今京疆直隶各省,人民多有信服其教者,恐流行日久,渐染滋深,害及中国人心,则廓清不易,伏祈敕下该部,严行禁止。”^[6]在樊绍祚上奏几天后,康熙去关外巡幸,为了避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带欧洲人同行。此时的马国贤还不知道樊绍祚上奏之事,他对康熙反常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于是,马国贤等欧洲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樊绍祚奏请禁教之事。马国贤认为康熙不带欧洲人去关外的原因是康熙想避开他们用上书请愿来麻烦他。

尽管马国贤和耶稣会士在中国礼仪问题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是在事关天主教在华命运的问题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面对樊绍祚的指控,马国贤和耶稣会士放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联合起来,尽力使事态朝着有利于传教士的方向发展。

经过协商,在京传教士派出苏霖(Joseph Suarez)、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和巴多明三人向康熙上书请愿。罗马传信部档案处藏有这三人的奏折,内容如下:“臣苏霖、纪理安、巴多明等谨奏,为仰求圣恩,始终保全事:窃臣等西洋人,受恩深重,不但日不能言,即笔亦不能录。今御奉史樊绍祚,疏斥天主教感众诬民等语,臣等闻之,不胜惊惧惶悚,其疏内诸款,皆属不深知臣等者,而天主教为邪为正,臣等为伪为诚,久在皇上圣明洞鉴之中,臣等不敢多赘辩明也。且于康熙三十一年,已经部议,上谕西洋人,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有旨通行各省,不但臣等之在中华者,时刻感激,即在西洋教中诸人,俱感激皇上圣心一体之恩。臣等远旅孤子,并无依倚,不善事物,不能周旋,惟俯伏迫切叩首,恳祈皇上至仁至慈大父母之心,怜悯保全,臣等始终顶戴,永沐弘恩,臣等无可报答,惟有上求天主,永保皇上万寿无疆而已。臣等凛凛兢兢,哀哀谨奏,伏祈重鉴。”^[7]

康熙把此事交由礼部处理。礼部经过讨论,否决了樊绍祚的奏折。在给康熙的奏疏中,礼部说:“臣等议得御史樊绍祚条奏,请将天主教禁止一节,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内阁奉上谕: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著有功绩,并无非作胡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奏请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钦遵。会议得,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等

因具题,通行各直省在案。又于四十六年二月内,由武英殿议得,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修道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不许居住,令往澳门安插等因具奏。通行各省,亦在案。今查得此等住堂西洋人,俱仰慕圣化,航海而来,与本国人为国家效力,今居各省堂中者,俱领有印票,各修其道,历有年所,并无妄作非为,其御史樊绍祚条奏,严行禁止之处,应无庸议可也。”^[6]礼部的决议很快被送给康熙,得到了康熙的批准。“这样进一步的指控和迫害就停止了,在关键时刻事情的发展有利于天主教士。”^[5]

1715年3月19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发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坚决反对中国礼仪。在通谕中,“教皇明确地批评耶稣会士默许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天主教义作出妥协的这种作法”^[8],从而又引起了新一轮禁教的浪潮。1717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上折,以外贸和传播天主教有害中国安全为借口请求禁教。

在奏折里,陈昂历数通商的坏处,把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恶行都归结到天主教的头上。康熙看完此奏折后就交给九卿讨论处理。马国贤等传教士一开始就知道陈昂上奏之事,但是他们对此事太过于掉以轻心。他们一则过于相信康熙对传教士的优待,二则相信康熙肯定能看出陈昂奏折中的明显错误。马国贤等人显然忘了,在中国,“皇帝是圣典最高的传播者,他是天子,是旧习俗的捍卫者,是整个国家躯体的灵魂”^[9],教皇禁约中“这些触及中国臣民的不合时宜的命令,使中国皇帝觉得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和有害的干涉,尤其是它们有损于本来可能会巩固帝国伦理秩序的准则”^[10]。

九卿经过讨论,做出了禁止天主教,驱逐传教士,拆毁教堂的决定,九卿的判决使在北京的传教士惊恐万状。在事关天主教在华命运的问题上,马国贤和耶稣会士再次联手。经过慎重考虑,传教士选出了苏霖、巴多明、穆敏远(Joao Mourao)三人在判决书送达给康熙之前入宫觐见为天主教辩护。遗憾的是,谒见康熙无果。这样,传教士只得另寻他法。巴多明请求对传教士有好感的九阿哥允禧和某大学士帮忙,他们设法延迟判决书送达康熙的时间,要求九卿再议,否决陈昂的奏折。马国贤说,在等待最终结果的“好长时间内,我们都处在极端的忧虑状态”^[11]。最后,九卿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决议中撤销了先前禁教、驱逐传教士的建议。九卿的最终决议如下:“至于基督教事宜,我们查阅各部档案后发现,皇帝于康熙八年批准过如下判

决:‘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康熙四十五年,皇帝又颁发了另一敕令:‘着给永不返回欧洲之西洋人颁发盖有印章的帝国执照(印票),注明其各自国籍、年龄、修会、入华时间及领票人许下的永不返回欧洲的承诺。着西洋人进宫见朕,领取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盖有印章的执照。此照可作为他们的证明。此敕令需严格遵守并存入档案。’鉴于敕令颁发后又过去了多时,(教会中)很可能混进了某些不良分子,因此,宜在八旗辖区、直隶及各省份以及辽东和其他各地予以禁止。臣等不敢擅作主张,特恭候陛下圣裁。”^[12]

康熙批准了九卿的决议。此决议措词含糊笼统,模棱两可,实际上不利于天主教。它在开始引证了康熙八年禁止天主教的敕令,在结尾又出现了禁教字样,这就使地方官员在理解此决议时会把它和康熙八年及四十五年的敕令联系起来,认为康熙是要禁教。

巴多明等再次觐见康熙,述说九卿决议的含糊不清,请求康熙不要禁教。康熙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的人无干。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将朕所给的票交看,就是传教的凭据,你们放心去。若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6]

康熙的答复使传教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于是,马国贤和众传教士一起入宫,想对康熙表示感谢。但是,康熙并没有接见他们,康熙只是派遣他的贴身太监魏珠传话给传教士。魏珠说:“陛下说你们不用感谢他,因为他并没有给你们什么恩惠。和去年在相似场合发布的谕令一样,禁止你们宗教的谕令只是被搁置了。陛下的话是说一不二的,从来不会废除他所颁布的谕令。”^[11]魏珠的话反映了康熙矛盾复杂的心态。教皇对中国礼仪的干涉使康熙火冒三丈,而教皇接二连三的禁令也使康熙怀疑领票的传教士内反对中国礼仪的不乏其人。康熙想禁教,但是又需要传教士为他服务,因而他批准了九卿含糊不清的决议,他本人对传教士的答复

也很模糊笼统。康熙此举想使传教士认识到皇权的森严和他作为中国伦理秩序代表的尊贵,想使他们不要再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争论不休。

通过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在华的天主教各派在中国传教问题上既有分歧,又有合作。然而,分歧要远远大于合作。中国礼仪之争愈闹愈烈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教派之间的分歧。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参考文献:

- [1]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2]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M]. London:J. Murray,1844.
- [3](美)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Astley, T.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III [M]. London:Printed for T. Astley,1747.
- [5]Weber, F. C.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Vol. II [M]. London:Printed for w. Taylor,1722-1723.
- [6]韩琦,吴昱.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Z].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 [8]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M]. Washington: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 [9](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10](法)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2](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彩红

The Missionary Matteo Ripa an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Early of Qing Dynasty

LIU Ya-xuan

Abstract: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The study of the Order of Pious Laborers missionary Matteo Ripa's words and actions in the controversy showed that main reason why each Catholic sect argued around the controversy very fiercely was they each understood Chinese cultur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e controversy also show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as very difficult.

Key words: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Matteo Ripa; Catholicism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作者: [刘亚轩](#), [LIU Ya-xuan](#)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浙江杭州, 310028](#)
 刊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27(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2条)

1.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2001
2.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1844
3. [苏尔·诺尔](#) [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 2001
4. [Astley, T](#)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1747
5. [Weber, F. C](#)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6. [韩琦](#), [吴昱](#)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 2006
7. [阎宗临](#)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2003
8.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2003
9. [夏瑞春](#)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1995
10. [沙百里](#) [中国基督徒史](#) 1998
11. [马国贤](#)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2004
12.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 2001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沈钦伦](#) [辩护中的尴尬——以严谟为个案试探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天主教徒的身份认同危机](#) 2006
 “中国礼仪之争”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接触的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和研究却缺少相关的汉语资料文献。所幸的是,随着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汉语文献的解冻,一批康熙朝前后完全由中国人写作的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中文文献为世人所发现。而本文将利用台北利氏学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中的资料,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以清初福建儒生基督教徒严谟为个案,对其在两种文化中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和他留下的十篇文章一一进行分类和考释。作为早期天主教徒中的代表,严谟同时也是传统的中国儒生,当两种身份发生冲突后,他虽然十分尴尬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本文试图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资料的考据法以及阐释学等方法,解剖严谟在“中国礼仪之争”中表现出的激烈争辩与内心矛盾,并试图由此剖析出当时一批中国士大夫在中西文化产生撞击时所共有的尴尬心态。
2. 期刊论文 [刘亚轩](#), [LIU Ya-xuan](#) [清初来华传教士德理格与中国礼仪之争](#) - [衡水学院学报](#) 2008, 10(6)
 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的转变表明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也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3. 期刊论文 [韩星](#) [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 - [宗教学研究](#) 2002, ""(2)
 本文通过考察明末清初中国礼仪之争过程中不同方面对儒教的判释和定位,说明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真正的源头是在这里。对儒教如此截然相反的判释是由于各方面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儒教非教说更深刻地把握了儒教的本质,而儒教是教则是形式化的以偏盖全。这一争论影响到近代,乃至当今对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判定。
4. 学位论文 [刘亚轩](#)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研究](#) 2009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众多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的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则明显滞后。关于清初来华的遣使会士马国贤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通过本文对马国贤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国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国贤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马国贤的中国观对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降温起了重要的作用。
 2、马国贤的回忆录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为学者们研究康熙时的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3、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马国贤第一次把西方的铜版画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是制作木版画的传统。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园林热。
 4、马国贤为研究中国礼仪之争提供了更多更珍贵的材料。在礼仪之争中,欧洲社会的很多人士不再相信入华耶稣会士的报告。马国贤的报告恰好在此时出现,因而对当时的欧洲影响更大。

5、在中国留学史上，马国贤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是欧洲最早的中国人留学中心。中国学院体现了马国贤与利玛窦的适应路线不同的另外一种传教方法，在清朝厉行禁教时期，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马国贤的个案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华的传教士无论何门何派，无论其主观立场如何，都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也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对在华的非耶稣会士的研究，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5. 期刊论文 赵殿红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1(5)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9)是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重要人物。作为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他抱有积极的传教理想，并在实践中对多明我会的传教方法有所创新。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证了礼仪之争过程的关键阶段，与耶稣会士们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首次将礼仪问题在中国的分歧与争论公诸于众，从而将之由地方性事件变成世界性话题。他对中国的生动记录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6. 学位论文 周燕 法国耶稣会士兼“国王数学家”李明及其《中国近事报道》研究 2008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东西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耶稣会士则是成就这一辉煌的桥梁，但是，长期以来，许多人在言及此段时期耶稣会士的贡献时，总是把目光聚焦在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知名传教士身上，而忽略了许多对此段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的普通传教士的研究。

李明(LouisLeComte, 1655-1728)是一位法国耶稣会士，1687年被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身份与其余四位同伴派遣到中国，并卷入了与葡萄牙的保教权之争，1691年被迫返回法国。1696年，为了替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辩护，他著《中国近事报道》，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礼仪之争”的大辩论。1700年，《中国近事报道》遭到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贬责，被列为禁书。但是，《中国近事报道》虽然是为“适应政策”辩护而著，它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是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总结。由于该书对中国丰富的报道，使它成为18世纪欧洲人，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们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并且对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又重要影响的耶稣会士及其著作，中外学者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李明和他的《中国近事报道》又是这段历史重要的部分，所以很多人虽然只是简单提及，也出现不少错误，这对于我们正确、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显然是无益的。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研究李明及其《中国近事报道》。

一、李明作为“国王数学家”来华背景、来华经历。

二、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内容分析，主要通过与其早期传教士著作的比较研究，展现出欧洲人在认识中国的渐进过程和李明此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三、礼仪之争的背景和李明为礼仪之争所作的辩护，体现李明在礼仪之争中的作用。

四、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启蒙思想家们的具体影响，由此体现出他在影响启蒙思想家的“传教七”集体中的个人作用。

本文属于个案研究，希望通过对其个体深入细致地研究，推进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度。

7. 期刊论文 赵殿红 Zhao Dianhong 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 23(1)

近年来，多数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天主教史的研究作品，多讨论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及其“适应”策略，而对其他修会，包括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研究较少谈及。该文运用多种中、西材料，将明末清初在华的三个主要修会的来华人数及不同的传教方法进行了简要比较，并从不同修会间的固有冲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礼仪之争的部分根源和不可避免性。

8. 期刊论文 王超杰 利玛窦及其身后的汉学研究 -前沿2008, “”(6)

始于明末清初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东学西渐之门。这种最初纯粹观念性的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成为18世纪以来西方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源起。其后的二百年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勇敢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新世纪，尤为有意义。

9. 学位论文 冯建萍 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活动研究(1696-1949) 2009

方济各会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在陕西的天主教传播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后，方济各会传教士为了保证中国天主教传播工作的延续，领取了清政府颁发的“印票”，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教。在陕西，方济各会取代了耶稣会在教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要力量。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天主教陕西代牧区成立，罗马教廷任命方济各会士叶宗贤为首任代牧主教，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的传教活动，并将传教总堂设立在陕西泾阳鲁桥镇。“鸦片战争”后，方济各会凭借西方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抓住一切时机发展教务。“1862年的回民起义”、“1878年陕西特大旱灾”、“义和团运动”等特定历史事件，都为方济各会在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这些机会，方济各会建立了高陵通远坊传教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修建天主教堂，使之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在西安修建天主教南堂等传教场所，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教，扩大了方济各会的影响。民国时期，陕西形成八大教区的格局，方济各会占据了汉中、延安、西安、整屋、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八大教区中，除了汉中以外其他七个教区的领导权。在传教过程中方济各会以“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坚持“清贫福音”的传教路线，与耶稣会传教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教特点使得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10. 期刊论文 周燕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3(4)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就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hkgyglxyxb-shkxb200806012.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8f948112-08d1-4972-9142-9e4d008177b4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